

文学编序

序一

主题变奏七十弦 ——黄永玉文学创作概述

李 辉

文学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排在第一的……

文学让我得到了很多的自由。

我不明白写文章用秘书用录音机用电脑，怎么还能写出来。……叙述回忆录的时候需要秘书，文学是不行的，它有文字语句的讲究，有上下句音韵的节奏，有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够酝酿出来的那种情调和气氛，它不能光是讲故事，它要进入情境进入角色，要集中精神，鸦雀无声地促涌出来。

——黄永玉

纵观文学史，绝大多数文学家早在年轻之时就有了明确的文学自觉、激情与目标，创作高潮也很早得以形成。与之相比，有着艺术家身份的黄永玉则明显不同。与文学结缘七十年，但他的主要文学创作，则是在年过半百之后。他以自己的独特姿态，走着一条与其他文学家不同的

途径，其呈现方式也颇有不同。如果将之纳入文学史的范畴予以考察和界定，不难发现，黄永玉的确是一个特例，一个难以复制的“他”。

迄今为止，黄永玉文学道路已长达七十年，试将之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尝试与沉寂，从20世纪40年代初至1963年左右，约二十年；第二阶段——潜在写作，从1964年至1976年前后，约十二年；第三阶段——自觉与丰收，从1977年至今，近四十年……

星移斗转，七十年文学行程，主题不断变奏，尝试—沉寂—潜在—自觉—丰收……如此这般，黄永玉将自己的文学道路认真地书写在当代文学史的画卷上。

——李辉

两个场景的历史呼应

故乡，文学的摇篮。

1937年秋天，南方的厦门。十二岁的黄永玉，自家乡湘西凤凰漂泊而来，就读于厦门集美学校。开学之日，穿上校服学生装去照相。照片上的他，头戴学生帽，背手而立，抿着嘴，平视前方，神情显得镇静自如。他给家里寄

去照片，同时，还送给弟弟们一首诗：

太阳刚起了光芒

在我的床上

引起我的思潮

我不愿再在人海中彷徨

只要回到我的故乡凤凰

同着我那

永厚、永前、永福、永光

过着顽皮的景象

当年，由九岁的大弟弟黄永厚向弟弟们朗读这首思乡诗，七十多年后，年过八旬的这位弟弟仍能流畅地背诵它。他甚至说，每次朗诵，都想哭。诗句稚嫩，却非游戏之作，一个漂泊少年的真情告白，有着亲人之间可以充分理解的诗的力量。

这首思乡诗，是迄今为止所知的黄永玉最早的文学作品。

热爱文学，倾心文学创作，无疑是故乡对黄永玉的另外一种赐予。

黄永玉自幼感受着故乡漫溢而出的文学气息。在凤凰

成长的十二年，与文学相关的诸多元素：知识、情感、修养……一日日渗透于心。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母又均为受新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黄永玉识字很早，两三岁即开始背诵古诗，继而背诵四书五经。在背诵古诗、在听前辈们海阔天空讲故事的过程中，他接受着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最初熏陶。这种熏陶，与自然界的美丽、风土人情的丰富性以及凤凰的民间艺术氛围相辅相成，对于一种文学精神的形成，显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一点，可以说，黄永玉是一个文学的幸运儿。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是黄永玉晚年正在创作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小说主人公名叫序子（小名“狗狗”），原型即作者本人，小说中的朱雀城，即凤凰古城。小说当然有虚构成分，但它们显然是基于黄永玉儿时生活体验的再创造。如下两段叙述，颇能说明充满文学气息的家庭氛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让一颗幼小的心灵感受到诗意的滋润。

第一段叙述五岁左右的序子去乡下看望外婆，他与酷爱古诗词的二舅之间，有这样一番交流：

狗狗一边看远处屋瓦上的雪，一边听二舅讲话：

“你讲了好多，尽讲尽讲，一点都不好听！我一点都

不懂！”

“不懂不要紧，你长大就懂！唐人写雪不光写雪，写雪背后那些意思，你听过柳宗元的《江雪》吗？虞世南是个大书法家，诗也好：‘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他晓得天山上不分冬天夏天都是有雪，高山两边融的雪各流各的，变成大河。陈子良写雪也写别的事，让人跟在后面越跟越有意思：‘光映妆楼月，花承歌扇风。欲妒梅将柳，故落早春中。’古时候下雪天，臣子被召到宫里去陪皇帝喝酒吟诗，这些诗大多作得情不是情，景不是景，境没有境，又怕丢官杀头，都勉强得很。一怕，好句子就出来不了。”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第二段叙述十岁左右的序子在家里与母亲谈起柳宗元：

“你懂吗？”妈问。

“懂一点点，不懂的跳过去。他比唐朝别个人的文章好懂，也有意思。”序子很认真地讲，“诗也好！”

“他的文章你读过多少？”妈问。

“《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黔之驴》，

是胃先生教过的；我自己试着读《吊屈原文》、《谤誉》就不太懂，很不太懂。”序子笑起来。

“你可以问。”妈说。

“……不是一句两句的问题，很难问。我看完‘注’，看‘注’也不懂，翻《辞海》，哎，慢慢懂一点，懂一点也不太懂，真难。可惜，我一直跟胃先生就好，胃先生有走，怕我就懂得多了。——像吃东西，软的先吞了，硬的慢慢嚼……”

“他不仅仅是文学家，还是个很聪明的人，可惜活不到五十岁……”妈说。

“我想，怕也是……”序子低头看书，“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不止是可以画一张，还好像自己就是那个‘孤舟蓑笠翁’……”

婆忽然讲话了：

“做文章、作诗其实就是会讲‘巧话’！”

妈、序子还有子厚都看婆——

紧接着讲：

“脑筋不巧，蠢蠢笨笨，写出来有人看，是不是？”

爸爸淋得一身雪回来了：

“妈，你刚才讲哪样？我听到一点尾巴……”

序子原原本本告诉爸爸。

爸爸看着婆，忘记了抖雪脱罩衣：

“妈，你一个字认不得，几时想出这些话尖尖？我们书都白读了……”

“嗯！”婆一点表情都没有地坐着。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有文化的父母、二舅，不识字的祖母，全都沉浸在文学之中，活跃在黄永玉的儿时记忆里。

正是在故乡与家庭的这样一种氛围里，黄永玉与众不同的多方面文学能力得以孕育、滋长——他对语言极为敏感，每到一地，他都能很快地掌握当地方言，讲故事时，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不同人的声音与语气；他的记忆力令人叹服，精于对细节的描述；他擅长观察，尤其对形象、外貌、景物、格局等有出色的把握与描述……

1951年，当黄永玉初显创作才华时，作家汪曾祺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黄永玉身上具有难得的天赋。由画谈起，又不仅限于此。他写道：“永玉是有丰富的生活的，他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都是我们无法梦见的故事，他的特殊的好‘记性’，他的对事物的多情的、过目

不忘的感受，是他的不竭的创作的源泉。”（《寄到永玉的展览会上》）黄永玉后来的创作拓展，他在绘画与文学诸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生动而丰富地诠释了汪曾祺的这一见解。

故乡与文学、艺术相关的一切影响、记忆，都在心底，它们是第一个场景的情感的、兴趣的诱发与支撑。我们不妨将黄永玉十二岁时的这一次即兴写诗，看做他懵懂之间从事文学创作的一次起步，此时的他，当然并不知道自己还会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走得很远，一直走到今天。

如果将黄永玉在1937年厦门写下思乡诗的时刻作为他的第一个文学场景，那么，时隔七十五年之后，另一个文学场景出现在我们面前——

2012年的春天，十二岁的那位少年如今已是八十八岁的老人。这个春天，几乎每天上午他都会端坐书桌前，在印着“黄永玉用”的竖行稿子上，用钢笔写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黄永玉萌发创作这部小说的想法很早。20世纪40年代初，刚刚二十岁时，他在福建漂泊期间第一次开始创作，提笔写过片段，战争年代，生活所迫，写作无法进行，他只好放弃。60年代中期，在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的社

教工作队时，他再次想到这部小说，欲重新提笔，但“文革”突兀而至，又未如愿。1990年前后，他终于有机会静下心来开始创造《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完成十几万字后一度停笔，十几年后，2008年再续写。不同于当今绝大多数作家常常等作品完稿后一次性集中发表，黄永玉创作《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过程，颇类似于老舍、茅盾、巴金、沈从文等现代作家当年的状态，作品一边写，一边发表，连载这一作品的是中国最重要的大型文学刊物之一《收获》。如今，小说已经连载至第四年，篇幅达五十多万字，但序子才刚刚写到十岁。

显然，《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是贯穿黄永玉一生的美丽的文学梦想。在绘画艺术领域，他已蜚声中外，他却对此远远不满足，即便到了八十岁，他也如同青年时代一样，依旧拥有文学的激情和雄心。在这部小说已经完成的篇幅里，黄永玉以具有现代汉语之美的个性叙述，描写自己儿时经历，欲借此勾画出广阔社会背景下的历史沧桑。沧桑之中，故乡的风俗人情，个体生命的忧伤，漫溢文学的诗意。我们有理由对《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以后的叙述和格局充满期待，它将会是一部具有民俗史、生活演进史架构的长篇巨制。

在黄永玉写于2012年3月的下面段落中，小说主人公序子长到了十岁：

眼看就秋深了。

秋深是什么意思呢？

凉了。

人身上里里外外都簌簌清爽。

狗呀，雀儿呀，不像热天那么委顿了，连托钵子讨饭的叫花子走在街上都潇洒精神。

热天时候，小孩子竹竿子牵着的瞎子算命先生，拉胡琴很让睡中午觉的人听来摇篮里的安逸，到秋天，坐在屋里听到瞎子算命先生路过，那就睡不着了，映在石板街上远去的一抹清亮的哀苦……

水蓝了。山上金黄叶梢上那边飞着南去的雁鹅，白天飞，月亮天也飞，在天上“哦哦”招呼着儿女。

朱雀猎人从来不打雁鹅的，说它们或者带着远戍边关当兵人的家信。

序子和那一帮家伙都喜欢在城墙上看雁鹅，排成一字形、人字形，晓得它们要漂洋过海到远远的热带去。燕子也去，有的小鸟也去，飞不动的时候就歇在飞着的雁鹅背

上，像穷人搭便船一样。动物也懂得“助人为快乐之本”的道理。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在作者以精致而跳跃的文字描写的美丽风景中，序子已长到十岁，再过两年，他即将离开家乡“朱雀城”漂泊而行，走进现实生活中那位十二岁少年在集美学校即兴写诗的场景。八十八岁的作者，十岁的序子，虚实相间，在文学叙述的情境中交融一体，且不妨将之视为一次很好的文学穿越。十二岁少年自己也不会想到，当年的一次文学即兴，最终变成了漫长的行旅，从厦门一直走到了七十年后的北京。

的确，编选《黄永玉全集》文学编时，上述两个场景总在我眼前闪现。如果说少年时的即兴赠诗是不少人都曾有过的兴趣挥洒，并不能证明文学一定将与此人的人生形成一种特殊关系，最初的场景自然也就少了历史的况味，但是，假如这位少年走进耄耋之年，仍然孜孜于文学创作，陶醉其中，那么，最初的与文学相关的那一场景，就有了充分解读的空间——何况，这个作家本来是以画家而著称。

画家、作家，哪一种身份最为重要？

美术、文学，哪一种形式才是心中最爱？

对于一个热情拥抱文学的人而言，藏于心底从而影响并决定他感应现实、营造艺术的诸多元素，到底是哪些？

由专业美术出版社推出的这套《黄永玉全集》，为何扩大格局，在绘画、雕塑、工艺等艺术作品之外，特意增加六卷“文学编”？这就有必要将黄永玉的文学创作活动加以概述。从这一概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黄永玉虽以艺术家著称，但他与文学的渊源颇深，成就斐然。

如果从20世纪40年代初期开始发表作品算起，黄永玉的文学道路迄今已走过七十年。早期写作可视为文学尝试，尚处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这种状态在较长时间里断断续续，一直到“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时期，才如井喷一般转变为充分的自觉与热情。尽管此时他已年过半百，但他的文学创作却进入了一个全面开花与收获的季节。更令人赞叹的是，这一创作高潮，延续三十年而不衰，哪怕在他八十岁之后的今天，依然保持一种旺盛的、上升的状态。

纵观文学史，绝大多数文学家早在年轻之时就有了明确的文学自觉、激情与目标，创作高潮也很早得以形成。

与之相比，有着艺术家身份的黄永玉则明显不同。与文学结缘七十年，但他的主要文学创作，则是在年过半百之后。他以自己的独特姿态，走着一条与其他文学家不同的途径，其呈现方式也颇有不同。如果将之纳入文学史的范畴予以考察和界定，不难发现，黄永玉的确是一个特例，一个难以复制的“他”。

迄今为止，黄永玉文学道路已长达七十年，试将之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尝试与沉寂，从20世纪40年代初至1963年左右，约二十年；

第二阶段——潜在写作，从1964年至1976年前后，约十二年；

第三阶段——自觉与丰收，从1977年至今，近四十年。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三个创作阶段的时间划分，并不严格，仅视基本状态而定。另外，黄永玉目前仍在进行长篇小说等作品的写作，所谓“第三阶段”，实际上尚未结束，因此，这里特地将第三阶段的截止时间，暂且以“至今”为表述，以“正在进行时”的写作状态。

星移斗转，七十年文学行程，主题不断变奏，尝试—沉寂—潜在—自觉—丰收……如此这般，黄永玉将自己的

文学道路认真地书写在当代文学史的画卷上。

尝试与沉寂：谁人能言得与失？

诗歌是黄永玉最早的文学尝试。

据黄永玉在1993年的回忆，他在报刊上开始发表诗歌，是在1943年左右，约二十岁。他这样说：

我写诗，时间不短了。现在沈阳作家协会的单复兄，在福建仙游的《闽中日报》宽宏大量地登过我的一首诗《三八那天》和一幅木刻插图。1943年左右，在江西信丰县，诗人雷石榆、谷斯范和野曼的《干报》报纸副刊登过我的一首短诗，写但丁在圣三一桥邂逅比雅特丽斯，和我在信丰大桥约会我的女朋友的行为具有相同伟大的意义。题目已经模糊了。我那时候十九、二十岁吧！一下子以为自己是查泰顿，一下子以为自己是拜伦或雪莱，是但丁；更长的时间，以为自己是玛耶诃夫斯基，甚至模仿他寡着嘴、睁大眼睛、脖子上套一条丝围巾照过一张得意了好久的相。

1945年、1946年在江西上犹《凯报》（在别的文章中提到信丰县的《凯报》，不对！）做美术编辑工作，艾雯

编副刊，好像除了木刻之外，我也还写过小说和诗这类的东西向她投稿。

（诗集《老婆呀，不要哭》序，经黄永玉2012年修订）

黄永玉提到的上述作品，暂未查到。目前已发现的早期公开发表的诗歌有三首。其一，《风车和我的瞌睡》，三十余行，1947年8月创作于上海，同年9月发表于诗人曹辛之在上海主编的《诗创造》丛刊之三《骷髅舞》；其二，反映香港电车工人罢工事件的长诗《无名街报告书》，二百余行，1951年12月创作于香港，以整版篇幅发表于1952年1月15日香港《文汇报》副刊。其三，与《无名街报告书》同期，发表与罢工事件相关的另一首诗《一定再见》。

从诗开始，黄永玉早期的文学尝试随之扩展至电影剧本、散文、文艺随感等不同体裁。并且，这一尝试，又主要集中于1947年至1953年的六年。

六年时间里，黄永玉辗转于上海、福建、台湾、香港等地，并于1948年定居香港。在此期间，以木刻创作开始活跃于美术界的黄永玉，与文学界有着广泛交往。在政治选择和思想倾向上，他属于左翼文学圈，与楼适夷、聂绀

弩等中共地下党员保持着密切往来，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也受到一定影响。与此同时，由于沈从文是其表叔，黄永玉又与沈从文、萧乾等被视为“第三条道路”的所谓“反动文人”有着良好关系，在文学品位和风格取向上，受到他们的影响。除上述作家之外，还可以轻易再列举出一长串与他来往密切、相互影响的作家、诗人、编辑，如臧克家、唐弢、冯雪峰、端木蕻良、黄裳、汪曾祺、陈敬容、司马文森、罗承勋（罗孚）……可以说，开始文学尝试的黄永玉，得天独厚地拥有了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文学氛围，如鱼得水，畅游其中。

几乎与发表诗歌的同时，黄永玉便开始了散文写作。1948年从台北抵达香港后，他发表了散文《台湾归来记杨逵》。1950年，他回湘西旅行，为香港《大公报》撰写长篇游记《火里凤凰》在副刊连载，集旅行观感、故乡记忆、人物特写于一体，可谓早期创作中最为重要的散文作品。

黄永玉在第一阶段最有广泛影响的作品，是他的电影创作。1951年，黄永玉在香港为长城电影公司和龙马公司创作两部电影剧本：《儿女经》和《海上故事》。其中《儿女经》拍摄成功并公映。《海上故事》剧本已完成，在酝酿拍摄时，因导演费穆的突然病逝而夭折。